



世纪前沿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 著

Liah Greenfeld

张京生 刘新义 译

资本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资本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美] 里亚·格林菲尔德 著 张京生 刘新义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美)格林菲尔德(Greenfeld, L.)著；张京生，刘新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ISBN 978-7-208-08279-3

I. 资… II. ①格…②张…③刘… III. 民族主义-关系-经济增长-研究 IV. F061.2 F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8386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田 青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资本主义精神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

[美]里亚·格林菲尔德 著

张京生 刘新义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36.75

插 页 4

字 数 501,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279-3/D·1498

定 价 52.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致 谢

一位审核本书初稿的匿名评论家对作者的学科归属关系感到纳闷。书稿的某些部分显示她是个经济学家，其余部分似乎映射出史学家的手笔，还有一些部分则使这位评论家想到了政治科学。而全书则令人难下判断。我认为这是对本人的著述所给予的最富有鼓励性的溢美之辞之一（所以理应排名本致谢之首），而且其鼓励意味尤其明显，因为我的“真实”学科身份——我接受的是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的训练——显然一直藏而不露；我已经做到左右逢源、融会贯通了。

我的这位评论家所遇到的困难证实了运用一体化方法对现实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就我而言，该方法的有效性容不得任何疑虑。社会经验的领域纷繁复杂地相互联系并且相互依存，试图孤立地研究其中任何一个领域无异于在生物学领域中创立一门专事腿部或胃部研究的独立的附属专科。所有这些经验，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家庭的，无论其具有何等公众性和物质性，都可以在文化意义上——也就是在象征意义上——加以界定，因为文化使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试图理解社会现实而不涉及文化，类似于探讨现代生物学而否认遗传学的关联性。最后，社会经验从其定义上来说是在历史中的事情，是大量社会进程的集合名词；脱离历史语境来研究社会经验必然使人对社会现实的知识局限在一部多方位、变化多端、活生生的影片的一张孤立的快照上。

然而，用于研究社会现实的文化和历史一体化方法所具有的明显的

有效性既不能减弱其异类性，也不能使其明显不合理的——结构的、机械的，乃至历史的——替代方法非主流化。谁也不能把握十足地单独挑战依然在位的正统学说。因此，正是得益于某些机构和个人的鼓励和支持，我才斗胆一反流行的学术规范，翻越学科栅栏并且不理睬设置在栅栏一侧的清晰明了的“不得非法侵入”的标志，而且免遭(相关)惩罚。实实在在地讲，本书的完成归功于那些大学教授们的支持，他们来自波士顿大学一家独特的跨学科学院，那里为我提供了一个适宜和宽容的学术家园；我尤其应该感谢将我带往这个家园的约翰·西尔伯和克劳迪奥·贝利斯。本书的出版得益于大卫·兰德斯帮助，他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史学家，更是一位伟人。我无言表达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只是想让他知道，我清楚我所欠他的情分。

很多同事，远近皆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乃至生物学家(!)，以及众多研究英国、美国、荷兰、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显然也包括经济史和文化史)的专才和通才们，毫不吝惜他们的宝贵时间，对本书的章节进行了阅读和评论，并贡献出他们的专业知识。我向他们表示感谢并为本书尽可能简短的致谢名录而深表歉意，但这个名录必须包括丹尼尔·贝尔、凯文·多克、内森·格兰泽、理查德·约翰、苏珊娜·凯勒、汉斯·科恩伯格、约翰·兰普、沃尔特·拉克尔、查尔斯·林霍尔姆、格伦·劳里、杰弗里·迈伦、坎德勒·罗森伯格、俊作知佳子、迈克尔·瑟曼、克劳迪奥·贝利斯和埃兹拉·沃格尔。

埃尔哈特基金会资助了一项1997年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夏季研究活动，并于1998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中心为无授课任务的学者们提供了一学期的时间，从而使参与者得以在国会图书馆附近度过这段光阴。在此期间，我完成了关于德国和日本的章节。在波士顿，得益于布伦丹·杜利的惠助，我又能利用另一家大型图书馆——怀德纳图书馆(在此期间我一直在考虑某些私人财产国有化的优点)。

我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前任总编阿依达·唐纳德，是他接受了本

书。我感谢本书的编辑迈克尔·阿伦森，他的建议和编辑处理能力令我钦佩不已。还应该感谢那些匿名评论家，他们不惜时间审读漫长的文稿并容忍作者与其有争议的论点。还要感谢版面文字编辑阿曼达·赫勒，她仔细认真地对付我所使用的逗号（在她看来，数量太多）及（数量不足的）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冠词，而我生活在英语环境下已达20年，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仍然是些“隐藏的秘密”。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已经因几种语言而欠下很多人情债。东京中央大学的俊作知佳子教授引导着两眼一抹黑的我翻阅了本居宣长的早期版本并严谨地监督和编辑我所使用的其他日语文本。迈克尔·瑟曼博士审阅并为我翻译了荷兰的资料。他们的帮助是无价的。但英语却是最需要帮助的语言。我的学生——第一批被本书俘虏的听众——含蓄而又执著地试图提醒我注意某些潜在的问题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其中包括句法方面的建议。在此，我必须特别提及奥利佛·贝努瓦、澳西科·卡尔、扎纳·西塔克、乔纳森·伊斯特伍德、罗萨尼·佛利塞娄（1998—1999年现代性研讨会的成员）以及彼得·塔姆。乔纳森·伊斯特伍德勇敢地肩负起独当一面的责任，除帮助整理参考文献和索引外，还确保准确无误地使用那些棘手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伊里娜·奥斯托夫斯卡娅则尽力改正伊斯特伍德遗漏下的未修改的内容。迈克尔·麦克南也参与其中，或增或删所有格符号，尤其是注释中的内容。我肯定这些集体的努力使本书的可读性增色不少，否则就面目全非了。

面临着是否完全删除注释的抉择，而出版社又敦促我尽可能节约版面，于是我把本来分布在各个页面的参考文献通篇合并归一。合成的注释，除非另作注明，一般按照讨论中所引用材料出现的顺序列举具体参考书目。对于由此可能给读者引起的任何不便我表示歉意，但是我认为，注释无论怎样压缩，将其附录在书中要比将它们张贴到因特网上更好。

本书的序言和第一章收录了我的部分文章的内容——“国家的价值：民族主义的某些经济内涵”和“经济竞争性的诞生”，分别发表于

《批评与评论》(*Critical Review*)的第9卷第4期(1995年秋)和第10卷第3期(1996年夏)。我感谢编辑杰弗里·弗里德曼提出的宝贵意见。

在我撰写《资本主义精神》的过程中,与我息息相关的精神是伟大的马克斯·韦伯的精神:本书所借用的标题明白地表现出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启发。但是,倘若我不感谢一位匿名评论家为《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3年3月27日)的投稿,实在是一大疏漏,因为他指出了我的书中所欠缺的有关经济的内容,当时我的那本《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刚刚出版。那条意见直接促使我决意论证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写于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

2001年3月

目录

致谢/1

导言/1

第一部分 民族主义发端的又一画面

第一章 资本主义精神与英国经济奇迹/33

第二章 “17 世纪的伟大例外” /69

第二部分 欧洲大陆新经济意识的传播

第三章 第一个皈依者：法国/127

第四章 统一行动的力量：资本主义精神在德国/184

第三部分 亚洲的挑战：日本之路

第五章 日本民族主义/267

第六章 竞赛与格斗/348

第四部分 经济文明：新世界的资本主义精神

第七章 探索美国体制/431

第八章 突飞猛进/502

跋：站在 2000 年的回顾/557

导 言

本书试图回答两个问题：(1)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即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2)是什么因素使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尤其是美国意识中占据了如此显赫的地位，以至于我们的文明事实上可被称为“经济文明”？或者说，芸芸众生何以背弃源于自我认知的历史经验和启示，转而相信经济增长(且视其为天经地义)才是社会进步和政通人和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本书旨在阐明直接动因或原因，而非条件：现代经济和“经济文明”为何出现，而不是如何出现。新经济倾向在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出现——这些最初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经济成就的范例，法国除外——为回答第一个问题提供了经验主义基础。为验证这一论点，笔者还将分析荷兰共和国这一耐人寻味的个案。有些学者认为荷兰是最早的现代经济形态之一。它理应如此(因为拥有一切必备的条件)，而事实上则不然。第二个问题将结合美国的情况加以考察——那里是“经济文明”的诞生地，也是其得以兴盛的沃土。

笔者的中心论点是：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趋向发展的决定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据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主义使然。本书所论及的民族主义概念基于笔者较早的一本书《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的论点。该书分析了这一至关重要现象的性质，并且追溯了其在英国的起源，及其后来在法国、俄罗

斯、德国和美国的传播。考虑到读者对那项早期研究成果可能不甚了解(尽管这对笔者来说是多么痛苦),同时还考虑到本书的文本不应该因为重申在别处已经被阐述和证实的命题而受到损害,笔者有必要对本书所涉及的某些概念加以界定。对于主要感兴趣于民族主义的经济意义的读者而言,这些概念将会提供一个比较容易的参照点。

民族主义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独特形式。它起源于16世纪早期的英国,后逐渐扩散,先传至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后又在18世纪进入法国和俄罗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又先后征服了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洲大部 and 非洲部分地区。位于这一社会意识核心层面的,是一种强制性的、蕴涵丰富的社会映像,被称之为“民族国家”,即一个由众多拥有基本平等权利的成员组成的主权社团的映像。民主是民族意识的固有特征:人人平等代表着它所昭示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泛主权自治则是其根本的政治原则。然而,这两项原则常可引出大相径庭的解读,因而导致相去甚远的社会和政治格局。对它们的解读一是取决于将民族看成是综合体还是单一体;二是取决于民族成员,即民族性的界定标准,是公民性的还是种族性的。这些变体(理论上说,这些变体可有四种组合)在实践中产生了民族主义的三种直接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形态和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个人主义—公民型、集体主义—公民型,以及集体主义—一种族型。

个人主义—公民型是民族主义的初始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民族的综合性定义,即社会是由个人组合而成的观念,与民族性的公民概念融为一体。正是由于构成民族国家的个人被看成是平等和自由的,因而该民族国家才被看作是主权自治的:它反映出其成员的素质。因此,公民的民族性等同于公民权,也就是说在原则上等同于对某些权利和义务的有意识的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的成员资格最终取决于个人成为其成员的意愿;民族性与宗教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它既可以取得也能够丧失。倘若所有形态的民族主义都意味着民主,那么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所意味的则是个人化,或自由化的民主。个人

主义—公民型民族国家的意愿就是其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其政府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原则上都具有代表性；它们崇尚个人人权并培育相应的制度予以保护。

与之不同的是，集体化民族主义视民族国家为集体化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意愿、需求和利益。它的意愿、需求和利益优先于组成该民族国家的个人的意愿、需求和利益。这些个人的意愿、需求和利益不能以多数人的意愿、需求和利益来衡量。民族国家的意愿必须由具有特殊素质的精英们来确定。这些精英显然是自封的，同时也由衷地自信确实代表着全民族的意愿。现代独裁制度无一例外地都是集体化民族主义的产物；它们所效忠的民主是大众化民主。

最常见的集体化民族主义形式（一般意义上的最常见的集体化民族主义的形式）是集体主义—种族型民族主义。它将民族的单一化定义与成员的种族化概念相结合，认为民族性是一个固有的遗传性特征，血脉相传，独立于个人意志，具有非与生俱来便无法拥有，一旦获得则无法放弃的特质。集体主义—种族型民族主义中的种族要素强化了其集体主义要素的独裁蕴涵；它对民族性所持的准生物学（最终是种族主义）的观念强化了其将个人视为民族这样一个更大的理想化的生物体中的生物成员或细胞，因而拒绝给予其成员丝毫个人自由。在这一框架下，民族国家的特权和主权自治被重新界定为免受外部势力统治的自由。

个人主义—公民型和集体主义—种族型民族主义均含有互相强化的构成要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民族的单一性定义与民族性的公民标准的结合产生了一个相互矛盾的、在认知上麻烦丛生的类型。集体主义—公民型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反映出一种复合视觉。第一个这样的民族国家便是法国。其动荡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其众多民族理想间所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种种矛盾。

这类民族主义（即这类社会意识和认同）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现实的蓝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铸就了这一现实，进而直接和明显地影响着恰好生活在这一社会现实中的人。生活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

义、公民型和种族型民族国家中的个人的体验可能有天壤之别。然而，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些体验却极为相似：民族主义的包容性及其成员享有基本平等权利和泛主权自治的核心原则（无论是怎样解释和实施）都赋予具有民族认同感的人一种尊严感，这种感觉是大多数此前的人们所无从体验的。正是这种尊严感才构成了民族爱国主义和对民族事业忠诚的基础。对局外人而言，这种表现往往是缺乏理性的。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尊严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民族主义：通向现代性的五条道路》一书中，我重点论述了广义的民族主义和五种民族主义的具体范例在特殊情况下的形成过程。之所以选择这五个范例，是因为它们在现代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我在该书中对民族主义所作解释的影响程度而言，不过是一笔带过，且多与政治影响有关。然而，该书的中心前提是，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构成要素或组织原则。我当时预计，民族主义的本质特性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将会触及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本研究的重点则在于理清民族主义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间接地延续了笔者在上一部书中所开始的研究。

谁说一切不过是经济而已？

民族主义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根据在 20 世纪后 50 年社会科学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加以考察的。该理论将诸如工业化、商业化、资本主义的壮大等经济进程视为万物之本，而将任何其他事物——如社会关系、政治机构、文化，即人们感知事物的方式——视为次要的、反思性的，或至少是依赖于上述基本进程的事物。原则上讲，所有居于次位的事物理应是彼此平等的，而事实上这些事物中有些则处于更为次要的地位。一般而言，文化被认为与经济学的物质客观性相距最远，因而也最微不足道。用一位著名作家的话说，脱

离了经济发展进程，文化就“无历史，无发展”。作为一种附带现象，文化所代表的是经济发展在大脑中的投射，恰似一幢建筑物投射出的阴影——各种特定的文化形态与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相匹配，或者说它们作为各个经济体制的系统需求的阶段性功能的要求而出现，以帮助实现其经济潜能。由于民族主义本质上属于感知范畴，因而也属于文化层面，并且与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环环相扣，因而它要么被视为经济现代化的反映，要么被看作是经济现代化的功能性先决条件。^[1]概言之，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成因。

这一立场颇有些耐人寻味的启示，也许会令其今天的拥戴者们难以入眠。从逻辑上讲，这些启示源于认定民族主义是依赖于经济学的这一假定：若假定民族主义是某一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比方说是早期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产物——那么这一阶段的完成就必然意味着民族主义的终结。当今，不少人认为我们是生活在资本主义晚期，或者说是后工业化社会时期。但不幸的是，民族主义非但没有离去，而且连行将离去的蛛丝马迹也未曾显露。这种对最受尊敬的社会科学家理性思辨的置若罔闻，对自己所寄予无限忠诚的法则的背道而驰在许多方面令人震惊。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它准确地展现出社会科学在其顽固的、臆想的科学唯物主义方面，已经与我们多数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是何其相悖。当然，这种结构主义的立场一直受到质疑。马克斯·韦伯过去就对它持有异议。现在，许多著名学者对它的批评更是直言不讳。

然而，这一模式的支配地位依然牢固——且不论其他理由，原因是它与现代西方社会生活，尤其是与美国如此显赫的经济领域那样地般配吻合。一般而言，美国人，还有其他西方人，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科学家几乎不屑一顾；他们确实把繁荣看作是幸福之本，将经济发展看作是所有其他社会进步的基础——一个公正社会不可或缺的条件和优势所在。我们渐渐地相信，只要能够使经济发展达到某个令人满意的水平，所有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因而自然而然地将经济发展作为我

们关注和牵挂的焦点。这种观点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私生活，也造就了我们的外交政策。如果我们不是坚定地相信今天的市场改革意味着明天的自由化民主，为什么我们会置俄罗斯人民的意愿于不顾，明知要付出惨重的政治代价，却执意要迫使俄罗斯进行市场改革呢？而在150年前，这还是一个革命性的观点。

这一观点是怎样取得了支配地位，经济领域又是怎样在我们的思维和体验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中心地位，是个很少有人提及的问题。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们一直在无休止地讨论民族国家取得的相对繁荣和它们在工业竞争中的成败得失的原因所在，但却从不问及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竞争，为什么各个民族国家都乐于此道。他们认为这一点是不言而喻、无需解释的。然而，事实绝非如此。在许多历史悠久的社会中，经济活动占据了参与其中的各个阶层的领地——直至社会阶梯和价值层级的末端。但这些阶层并不意味着地位，因而也无法吸引天才。毋庸置疑，繁荣胜于贫乏，但绝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也远不能与幸福等同。事实上，繁荣经常被看作是一种障碍。众所周知，圣·马修曾经说过：“骆驼钻针眼比富人进天堂要容易得多。”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在我们所处的社会——这一点显然已经变化了。^[2]但是，只有线性的、决定论的历史观，即假定历史为一连串的阶段和与之相适应的统一系统需求，同时又忽略文化和历史进程的偶发性质之间的经验性差别，才有理由将这一变化看成是自然的。这一整套定性的假设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

奇怪的是，它与目前占支配地位的英美世界观何其相似。这两种立场的分歧在于对经济过程和力量的性质方面所持的不同观点（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是“生产力”，而我们的“经济主义”则强调供求间的相互影响）；但就其存在论和人类学的假设而言——即就有关社会现实和人性构成的观点而言——两者几乎相差无几。进一步说，虽然马克思是最先论述社会生活中经济中心论原理的人之一，但这一观念并非由他本人首创。现在看来，马克思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学的直接原因似乎是